

# 宗经:数字媒介时代汉字批评传播研究

刘金波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先秦以降,“宗经”一直是汉字批评至为重要的诗性文化批评传统、理论、方法与规范。汉语批评本质上就是汉字批评,是利用汉字表意的朦胧性、诗性、发散性和流动性特点,来进行汉语批评的诗性言说、人文言说和风格言说。在这一言说过程中,“宗经”传统一以贯之并不断发展与演变。但在数字媒介时代,汉字批评并未成为引领时代的经典与规范化的学术批评样式。利用新媒介手段进行符合时代发展方向与发展潮流的汉字批评传播的传统阐扬,在学术批评方面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需要进行“宗经”汉字批评传统传播的元典重归、文本重塑与方法重构。

[关键词] 宗经;汉字批评;元典;数字媒介;互文

[中图分类号] I10-03;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5-0044-06

近代以来,学科细分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当代奉西方学术规范为圭臬的学术论文写作,文献综述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但是学术研究查重、查新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学术研究中问题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面,亦即新的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似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写作的常识和共识。在这一常识和共识中,文献综述的“四字诀”——综(合)、梳(理)、(陈)述、评(价),已然是学者经常使用的较为规范的流程和方法。这种流程和方法,同样成为现代形态汉字批评的研究规范。梳理先秦以来的汉字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原道”“崇圣”“宗经”等是其更为传统更为丰富也更为精炼的在写作理念、文体形态、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学术规范。但不无遗憾的是,千百年来镂金错彩的汉字批评传统并未成为我们当下学术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此同时,数字媒介时代的汉字批评宗经传统何以传播同样成果难显,绩效不彰。究其原因,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外部原因,英语写作与英文学术期刊的强势地位,以目前的汉字批评暂难撼动。第二是自身因素,汉字批评“宗经”传统在数字媒介时代的传播需要在元典重归、文本重塑和方法重构方面进行新的建设与发展。

## 一、元典重归:汉字批评“宗经”传统的源与流

中国传统的汉语批评是以汉语作为批评语体以典范的汉语作品为批评文体的文艺理论研究。广义的汉语批评则泛指以汉语为表达方式与传播媒介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因为批评主体大多不以学术评论为饭碗和职业,他们这一群体的主体自在性也天然地决定了他们批评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批评事业的不确定性。文学家、哲学家、经学家、史学家甚至皇族成员、寺庙和尚、市井俗士、出版书商等群体都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有极其强烈的关注与非常经典的评价。

在这一关注和评价中,引领风尚的创作成果与创作样式,以及创作突出的创作者都会广受青睐,得到更加热烈的关注、追捧和模仿。曹植曾说:“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以断割。”<sup>①</sup>魏晋雅士的清谈,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韩愈的古文运动,李东阳的复古运动……都因创作主体引领风尚的地位和表现而直接影响当时的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亦即“说什么”与“怎么说”。

[收稿日期] 2020-08-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礼记》文化关键词流变与传播研究”(20YJA860006)。

[作者简介] 刘金波(1968—),男,湖北大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

汉语批评“说什么”，在此姑且不论。如果探讨其“怎么说”，自然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最古老文字之一的表意的象形文字——汉字。汉字集形象、声音与辞义于一体。其直观、优美、规律、容易辨识的特点使之既便于学习与表达，也便于联想与意会。从根本上说，汉语批评本质上就是汉字批评，就是利用汉字表意的朦胧性、诗性、发散性、流动性的特点，来进行汉语批评的诗性言说、人文言说和风格言说。从这种意义上说，汉语批评也就是汉字批评。也正因为如此，经典的以汉字作为媒介的汉字批评才气韵生动、意在言外、兴象风神。

汉字批评因汉字意识的发散性、汉字思维的民族性、汉字写作的直观性、汉字表意的特殊性和汉字本位的连续性，千百年来，不仅产生一大批经典的汉字批评成果，而且“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直是其主流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方法。也因为如此，汉字批评的“宗经”传统才一以贯之，并不断得以新变。

所谓“宗经”，即以经典为宗。“四书五经”之五经，即《诗》《书》《礼》《乐》《春秋》。自先秦时代孔孟始，“宗经”思想就开始萌芽。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所言“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是征圣、宗经之滥觞。语出《史记》：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对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sup>[1]</sup>

孟子认为，人非生而知之，需要在后天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人生的历练与成长也就是修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也就是法先王、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的过程。怎么学？学什么？自然是学圣人之道。

到了荀子，他一反孟子性善之说，认为人因为性恶，所以才要通过学习来向善。其《儒效》言：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sup>[2]</sup>

荀子著名的《劝学》篇更是明确指出学习之始、之终，即“始乎诵经，终乎读《礼》”<sup>②</sup>。礼作为封建统治的规则，作为个人行为的规范，是一个现实世界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也是一个混沌状态的人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并进而努力成为圣人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之中，人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学习”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需要和习惯。在不断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成长、完善，尽管这些经典有不完备之处，但学习、写作，都离不开圣人之道。

迨至汉儒扬雄，作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乃至传播学家，他继承孟子、荀子、董仲舒的经学思想，进一步强化儒家经典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为人以圣人为榜样，作文以经典为规范。“宗经”是文学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其《法言·问神》说：

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郭。”<sup>[3]</sup>

他认为，圣人之经，如高山仰止，似天地莫测。以其为宗，可以明了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体味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构建作文的文体法度。

及至南朝刘勰，十年出家的经历，也是他饱读诗书、精研儒道思想的过程。文德、文心与文道，都高度浓缩于《文心雕龙》之中。他是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集大成者。《五经》法天地之文，取自然之道；写天地至辉，晓生民之想，所以“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sup>[4]21</sup>。

作为元典的经书历久弥新，其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是千百年来先民的生存智慧的提炼与总结，是礼乐文化的经典与要义，是汉字批评的典范与楷模。正因为《五经》内容丰富而深刻，文辞恳切而又优美，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所以刘勰把它当作后世作文之楷模：

至于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sup>[4]22</sup>

① 见于《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42。

② 出自先秦荀子的《劝学》。

知人论世,惟务折衷。刘勰宗经的结果是,儒道释兼长或者说非儒道释兼有。多元的思想仍然掩盖不了宗经传统的光辉。

此后,唐代陈子昂主张“兴寄”,提倡汉魏风骨;萧颖士、韩愈、柳宗元等改革文风、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宋代程朱理学;元代大儒郝经恪守诗经汉学;明代经学家宋濂的经学思维;柄国 18 年的首辅李东阳学古、真情、养气;清代姚鼐、姚莹叔侄的大小精粗的圣人之学;乃至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等治小学,无不为“宗经”思想提供新的丰厚的滋养。

## 二、文本重塑:数字媒介时代汉字批评“宗经”传统传播的新变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颠覆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数字媒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与深度结合,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的传播广度与传播效果,提升了传播速度与传播效率,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新的方式。其中,汉字批评的宗经传统在数字媒介时代发生了文体形态方面的文本新变。

“数字媒介是一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将信息化转化成数字的形式进行存储、传播和接受的介质。”<sup>[5]</sup>因为数字媒介的庞大数据库平台功能,传播内容与传播介质的变化,网络的泛娱乐化倾向以及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社会现实,以经典为宗的传统汉字批评,无论是写作者还是传播者,无论是写作内容与表达方式,还是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都从特定层面的小众化高雅文化渐变为无差别的大众化泛娱乐化文化。具体来说,这种宗经传统在传播过程中的文本重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本材质的数字化——汉字批评宗经材质的传播媒介从铅与火变成光与电。甲骨文时代,作为表达与传播媒介的汉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及先秦时代的竹简,无不经过刀与剑的洗礼。及至纸张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作为表达与传播媒介的汉字则是铅字油墨在各种纸张上的印刷材质。而到了数字媒介时代,汉字则又新变为光电形式的数字材质。

正因为文本表达材质亦即作为媒介的汉字的使用材质的巨大变化,汉字批评的艺术形式也随之变化,同一形式之内,各有所表。文学家们或曰批评家们或曰写手们,在不同材质的使用阶段,文本表达是完全不同的。殷虚卜辞的甲骨文,商周铭刻的青铜器,周秦籀篆的竹简,诸子百家的简帛,汉体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乃至当下的网络小说,等等,以不同时期的汉字表述其内在深刻言说,用传神的笔墨华丽的词藻修饰文章,象外之旨与韵外之意的体貌,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表达效果等诸多层面都有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这正如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所指出的:“艺术则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即同一形式也,其表之也各不同。”<sup>[6]</sup>

其二,文本法则的灵活性——汉字批评宗经传统的法则从“制式”与“富言”到自由式表达。按照刘勰《文心雕龙》对“宗经”传统的规范表述,之所以宗经,是因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汉字批评以经典为宗,在于我们能够“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为了避免无病呻吟,言之无物,言之无文,文学创作可以从经典中搜寻法则,以古人经典文体为规范,掌握其创作理论、修辞方式、写作规律、表达方式、品鉴手法,等等。正因为文能宗经,所以“体有六义”。在刘勰那里,这“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吴林伯先生认为体为作品、风格。诡,巧也。风,教化。信,真实。<sup>[7]</sup>这既从思想内容作了深刻归纳,也从语言风格作了精辟分析,还从作品功能、作品形式进行了公允分析。宗经,虽然可以制式、富言,但是对于汉字批评的表达者,却又是一个对个人素养、能力要求很高的原则。能够学习、体味并遵从经典的法式,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或练就。汉语批评经典制式的高难度与语言表达典雅的高难度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汉字批评的表达与传播。

而在数字媒介时代,汉字批评的文本表达也因为网络沟通的便捷性、汉字输入的快捷性(人们在写作时甚至不需要记得某一个笔画很多的字怎么写),不仅使得从事汉字批评的从业者大大增加,而且使得文本表达的自由度与灵活性大大增强。不过,毋庸讳言的是,这个自由与灵活导致的负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无错不成文,二是海量的垃圾信息。

其三,文本形式的互动性——汉字批评宗经传统的“文以气为主”到实时互动。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文以气为主”。在传统中国诗学研究中,人们在阅读古人经典作品的同时,在贯彻宗经的原则、理念与方法的同时,是有浩然之气贯穿之中的。人们以“气”习圣人之道,通古今之变。人们从作品的气韵生动来了解古

今经典作品作者的思想与方法,以达到与作者神交的目的。但是在这个交流中,因为作者的不在场,我们只能通过汉字文本表达的作品来体味同时代或者不同时代作者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想,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我们怎么理解,意会大于言传。

数字媒介时代,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5G技术的革命性改变之下,传播学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万物互联”既包括物理性与生理性的连接,也包括心理性的连接。5G时代的海量传输,既有信息与事实的传输,也包含情绪的传递。<sup>[8]</sup>在5G时代意义上的宗经汉字批评的传播同样因为技术的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历史人物可以有深度介入的影像资料,对当代人物,可以万物互联,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即时互动,人一人之间的物理、生理与心理的深度沟通与交流。

### 三、方法重构——数字媒介时代汉字批评宗经传播的展望与猜想

数字媒介时代尤其是5G新技术的运用,汉字批评的表达、呈现与传播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方法。如何让我们的宗经传统变得更加丰富、简单、快捷与多元,是必须面对并深入思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固守经典与传统的同时,在寻求汉字文化尤其是元典文化关键词的根柢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立足当下,以新媒介技术手段重构汉字批评宗经传统,问境而致用,以适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其一,汉字批评元典数字化——汉字批评宗经数据库建设。由于圣人经典均是取法天地之文,效法自然之道,道、圣、经三者连缀互文,道乃圣之本,圣乃经之本,经乃文之本。刘勰认为,文章有简有繁,有显有隐。五经的文章都是简繁显隐的典范,后世作文都要以此为楷模: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sup>[4]11</sup>

文风雅正,不害体要;文辞切实,不伤正言。或简或繁或显或隐的表达,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在具体语境的运用。既曰经典,那么经典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能出错。可现实情况则是,一方面,因为时代的久远,版本的杂识,主编和编排编印者的素养及敬业精神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汉字批评的经典文本的勘误情况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这些经典的数字化同样错讹难免。一个原因是汉字的繁简转化,很多编排者运用电脑自带转换功能来进行编排,殊不知同音异体字,其义大变。如“汇”的古字有“匯”“彙”,即分指不同意义,用在不同语境。另一个原因是扫描照排技术的运用。这虽然极大地保证了古文经典的原汁原味,但扫描技术照排往往显得底版发黑,而通过技术白化处理,又极易导致古人疏证的文字缺失。如相关《礼记》版本的扫描版。

有鉴于此,汉字批评所宗之经,在数字媒介时代的首先要务即是建设各学科方向的专业性的经典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务求达到刘勰所言之“析辞务精”“必须练择”。宗经之中的练字的汉字批评,不仅在于创作理论,也在于创作实践;不仅在于思维方式,也在于话语方式;不仅在于品评鉴赏,也在于传播流变。

其二,汉字批评宗经传统的方法交叉与融合。任何学术研究,无不是在传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当我们带着新时代的新思维,利用新媒介的新视野重新审视广义的汉字批评的时候,当今时代更迫切地呼唤具有国际影响和国际视野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方案,更迫切地需要与我们的综合国力提升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表达。如果我们还固守在狭义的中国诗学范畴内的汉字批评宗经传统,我们必将失去占领学术制高点的机遇与路径。

从汉字批评的传统来看,经史子集各部经典汗牛充栋。历史上的汉字批评学术大家总体上是一通百通融会贯通的。但是西方分科治学的学科分类和专属于各学科的专业学术研究方法,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分。但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社会问题却是复杂多变而且是系统集成的。因而,通过对中国诗学的汉字批评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当下数字媒介技术进步关系进行系列探究,找寻多学科交叉路径,比如文学与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的深度交叉与融合,逐步形成适合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宗经新路径。

其三,数字媒介时代汉字批评的数字互文成为一种全新的时态与业态。根据20世纪60年代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概念,其基本含义则指“任何文本都是由一些引文拼合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外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sup>[9]</sup>,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汉字文本间各种数据是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人们似乎不太在乎数据和文字的意义,而更在乎其背后的关系。在以信息技术、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时代,互文性理论具有无比强大的经典诠释功能。这种诠释完全超越传统“宗经”意义上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诠释路径,而代之以符合时代潮流的以区块链、算法推荐、机器写作、超文本链接等以数

字技术为表征的、以汉字为材料和媒介的、以新理念新视野为观念的全新的汉字批评。传统汉字批评宗经传统的寻根、问道、造境、致用等均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首先,是在互联网时代,汉字批评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文本的生产与消费、阅读与理解、意义的生产与认知等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离不开人工心智、人工智能和机器写作。人机交互改变了我们的宗经环境和路径,也导致物质和精神的边界进一步变得模糊而复杂。这时候的文本信息、经典不再是一个意义明确、诠释稳定的意义空间。我们在汉字批评进行宗经传播的同时,同样可以像古人那样学习、模仿、借鉴、引用乃至戏仿,但是现时代的“宗经”却包含有复制粘贴、转发、超链接、搜索引擎等更加便捷的选择、交流、互动与关系。

其次,是交流主体身份进一步消解和汉字批评传播主体威权逐步弱化。传统的汉字批评宗经,需要对经典作家的身份做较透彻了解,所谓知人论世。经典作家相对于阅读者,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威权。经典作品的严谨性、逻辑性、规范性、权威性毋庸置疑。人们在阅读经典的同时,书写/言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局面。但是在数字媒介时代,高仿真的数字媒介(很多时候包括音视频互动)既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也有经典典雅的电子痕迹书写。电子数码的生产、组合、储存与转发都在瞬间完成,以像素显示和非线性书写的批评文本无法确定现实书写者和阅读者的在场或缺场,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消解了作者的主体地位。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不再仅仅是在知人论世基础上的对文本的解读与诠释,而更多的是依靠影像、背景、记忆和关系,是在网络流中的对话与交流的主体间性。所以兰多说:“当读者在一个文本或文本网络中移动时,他们不断地转移其试探和体验的中心,从而转移他们的重点或组织原则。换句话说,电子文本提供了一个无限可重新定位的系统,它的临时焦点取决于读者,读者在另一个意义上成为真正的活跃读者。”<sup>[10]</sup>在这种弱化的过程中,数字媒介导致批评主体、客体等身份变得多重、复杂、不稳定、多变、互换甚至是去中心化的。

最后,是工具化的自身和多维互动的互文连接。数字媒介的工具性,让人们的生活被技术改造,人们的阅读选择又反过来影响技术的发展与选择。一方面,当传统的汉字批评面临数字媒介的同时,我们认识经典、学习经典、表达经典乃至传播经典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数字技术。另一方面,汉字批评的宗经传统需要我们大量阅读经典,在经典的学习中理解、领悟、推理、记忆并产生情感共鸣。数字化的智能技术,让我们很多的学习、写作与阅读被机器取代,智能工具虽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同时也使我们自身工具化,成为技术的附庸,变成工具的奴隶。在数字化交流的语境下,无论是“人—人”还是“人—机”的交流与互动,都可以充分利用机器与网络,重构汉字批评的宗经传统,在多维互动乃至互文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在言辞、表情与肢体语言中充分交流、理解与互动、互信。

总之,千百年来,汉字批评“原道”“征圣”“宗经”一以贯之,互相配套。“宗经”传统需要我们注重内容事信,情深义重;风格清丽,文辞藻饰;返璞归真,正本清源。但是在数字媒介时代的革命性变化面前,汉字批评宗经传统的写作与传播同样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技术的更新换代在不断改变舆论的环境和形态,同时也加大了舆论研究的难度……舆论的形式当前也超越了传统的主要以文字为载体的存在方式,近年来网络‘表情包’的出现和风靡使得越来越多网民通过这种非文字的表达方式进行意见表达。”<sup>[11]</sup>我们必须适应数字媒介的变革,让汉字批评在元典重归、文本重塑和方法重构方面作出符合时代需要和技术选择的新的系列变化,这将使我们的汉字批评不仅能疗救网络写作的时代之弊,而且能进一步重视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传承与阐扬。

## [参 考 文 献]

- [1] 党圣元.老子析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375.
- [2]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33.
- [3] 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7.
-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5] 匡婷婷.数字媒介与文化传播研究[J].中国报业,2019(10):83—84.
- [6]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23—26.
- [7]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49.
- [8] 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1):5—10.
- [9]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M]//KRISTEVA J.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34—35.

[10] LANDOW G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11.

[11] 张宁,唐嘉仪.大数据与舆论研究的“知识图景”:基于“人与技术”分析框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3):87—99.

(责任编辑:程晓芝)

## Venerating Classic: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riticism in Digital Media Era

LIU Jin-bo

(Media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430072)

**Abstract:**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Venerating Classic”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 theory, method and norm of the poetic cultural criticis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ssence, Chinese language criticism is criticism of Chinese character using the vagueness, poetics, divergence and fluidity of Chinese ideograph characters to conduce to poetic, humanistic and stylistic criticism. In this process, the tradition of “Venerating Classic”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evolve. However, in the digital media era, Chinese character criticism begins to fall behind the times and is no longer the classic and standardized academic criticism paradigm. It is suggested that digital media be adopted to carry out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riticism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trend, and to highlight Chinese path, spirit and power in academic criticism.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carry out the classical canon reversion, text remolding and meth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riticism of “Venerating Classic”.

**Key words:** Venerating Classic; criticism of Chinese characters; classical canon; digital media; intertextuality

---

(上接第 43 页)

## Saint-Worshipping: The Origi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tegy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ZHANG Jin-m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Hubei Enshi 4450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aint” can be interpreted in many ways, such as pictophonetically, associatively, or as a borrowed word, with all related to a kind of hearing ability. In the ancient times when destiny was changeable and the people and gods were not mixed, “the saint” gradually changed from having special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heaven or god to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being virtuous and versatile. Till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aint” was widely admired by Confucianists, Taoists, Mohists and Legalists, and was entrusted with a variety of political ideal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Confucius changed from “the sage” of Confucianism to “the sage”, “the black sage” and “the civil king” of the world, reflecting a distinctive tendency from “the only saint” to “the only god”. Although some insightful people had recognized some unreasonable element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anctification” and “deification” was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e feudal royalty and formed a discourse rule,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saint; respecting the heaven; saint-worshipping; the only saint; the only god